



未来新世纪的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凯托——复旦学术会议论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未来新世纪的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凯托——复旦学术会议论文集

周敦仁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朱蓉贞 王定宇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未来新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凯托—复旦学术会议论文集

周敦仁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286 千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266—3/C·299 印数：1—1000 册

定价：19.00 元

前 言

1997年6月中旬，在上海希尔顿酒店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名称是“新世纪的市场改革：崛起中的经济强国——中国”。会议的发起主办单位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的凯托研究所。凯托研究所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思想库。它的研究人员中有美国前总统的主要经济顾问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双方于1988年9月联合举办过类似的学术研讨会，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和前景。

本次研讨会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前瞻性地探讨了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前景和可能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内容比较广泛，涉及贸易、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整个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香港经济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参考价值、社会保障、税收、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外汇管理等诸多方面。

外方发言者和评论者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包括香港）的角度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其中一些内容值得我们参考和思索，有的经验比如退休养老社会保障似可以适当借鉴。中方的发言者和评论者则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会议上存在着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看法，作为学术讨论应该是正常的。比如，

研究中国当代经济的美国著名学者尼古拉斯·拉迪认为，“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方案是否一定优于东欧国家的渐进式改革方案”。而我国的著名青年经济学家樊纲则认为，中国 17 年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国情，成就巨大，但其主要成果尚不在国有部门。从 1998 年俄罗斯经济的严重混乱和衰退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更加明确了。不过，这两位学者都积极肯定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绩。本书中也有少数篇幅涉及到中美关系。必须指出，会议在 1997 年 6 月召开，而 1997 年秋江泽民主席成功地进行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1998 年夏克林顿总统成功地对中国进行了回访。两国决定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两国关系。

这次会议的另一特点是与会者人数多，中外人士多达三百余人，同时发言者和评论者人数也不少。中方发言者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乌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这样的高层人士，有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林毅夫和张曙光，海闻等，还有上海的多位知名学者曹建明，王战，李昌道等。外方人士中有美国兰德公司经济研究院院长小查尔斯·沃尔夫、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司司长克劳斯·罗兰德、凯托研究所主席、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威廉·尼斯卡能、凯托研究所所长爱德华·柯林、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智利前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何塞·平尼拉、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副主编威廉·麦格恩、香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于渐等。还有许多其他著名学者。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和前市长汪道涵，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谢希德也在百忙中接见了会议主要参加者或在会议上致词。

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展望未来，又是一个“千福年”。无论全世界还是中国站在两个“千福年”之间，都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市场和市场经济。这次研讨会只不过是围绕相似题目的若干研讨会中的一个，虽然会议上的观点和提供的材料比较新颖和丰富。会议在 1997 年 6 月召开，也就是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前和东南亚金融风波爆发之前召开的。现在回过头来在新的发展了的形势下阅读这本论文集，也许还有进一步的体会和新的认识及认识的修正。

按约定，会议论文集分成中、英两种文字版本出书。两种版本的编辑取舍略有不同。凯托研究所副所长詹姆士·多恩对会议和中文版编辑都做出了贡献。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对中文版本的会议论文集出版给予了支持，在此特表感谢。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周敦仁 谨识

目 录

前言	周敦仁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	刘 吉 (1)
中国正在成为经济超级大国	小查尔斯·沃尔夫 (16)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中国面临选择	爱德华·柯林 (23)
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	裴敏欣 (31)
评论“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	汤姆·帕尔马 (51)
认识市场经济	周敦仁 (61)
道家思想和市场经济	詹姆士·多恩 (71)
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	林毅夫 (87)
中国尚未完成的经济试验	尼古拉斯·拉迪 (112)
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樊 纲 (126)
评论“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 的改革”	巴里·诺顿 (134)
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乌 杰 (141)
智利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何塞·平尼拉 (173)
非政府渠道提供的退休保障和医疗保健	迈克尔·特纳 (188)
评论“非政府渠道提供的退休保障和医 疗保健”	俞明德 (199)

适合中国的简单税则	史蒂芬·莫尔 (217)
评论“适合中国的简单税则”	张曙光 (239)
世贸组织和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目标	海 闻 (242)
评论“世贸组织和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目标”	威廉·尼斯卡能 (258)
中国外贸法规与贸易自由化	曹建明 (260)
贸易、安全及中美关系的症结	泰德·加伦·卡本特 (268)
中国电信业与世贸组织	米尔顿·穆勒 (274)
中国内地可以从香港学到什么?	威廉·J. 麦格恩 (285)
中国内地如何借鉴香港经济模式?	李昌道 (296)
香港和中国内地金融的自由化: 过去和未来	约瑟夫·Y.W. 彭 (300)
评论“香港和中国内地金融的自由化”	克劳斯·罗兰德 (306)
香港经济的自由及对中国的启示	詹姆士·关特尼 (317)
排除规章障碍: 改变外汇体制	王于渐 黄曼丽 (329)
自由贸易和中国的市场经济: 香港的经验	杨怀康 (346)
发展中的上海城市环境	王 战 (354)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改革开放必由之路	任荣祥 (361)
市场经济与中国农村妇女革命	周 晓 (370)
墨西哥透镜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安·瓦斯魁斯 (394)
可持续发展的议程	杰瑞·泰勒 (413)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 吉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尚未最后完成。按照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的设计，大约在 2020 年左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可以构成，大约 2050 年中国建设成中等发达的国家，才最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着漫长而艰巨的历程，因此这场改革能不能进行到底？如何顺利推进？前途如何？经常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不仅海外人士关心，国内的人也在不断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逝世，这个问题自然更成为关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焦点。作为一个学者，我愿意主要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发表一些不成熟的个人意见，抛砖引玉，以求教大方。我以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更远的背景和更基本的问题开始。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固然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人物来发动和设计，但这样巨大的历史事件从来不是个人的作为可以解释的。这个改革深植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中。我觉得有三个历史背景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个背景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有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强国梦，这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奋斗的事业。对于中国的任何政权、任何政党，这是他得失民心、兴衰存亡

的历史性的考验和历史性的课题。谁能实现这个梦，这个政权就能巩固，如果不能实现，这个政权迟早是要衰亡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中国曾经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强国梦。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太弱，中国强大的封建主义不允许。西方资产阶级列强又不允许。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将近一百年，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半个世纪。这个努力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个背景，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歧途。中国要搞社会主义，苏联是唯一可供借鉴的先例。但是，从50年代末起，苏联的经济发展每况愈下，直到最后崩溃。中国经济实践也日益显露出问题。在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论十大关系》。他的巨大意义就在于第一次在理论上提出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有很多问题。至少有十大问题。但是，当时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如何来修补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而且基本办法是采取“抓革命促生产”。结果陷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上去了。

第三个背景，叫作“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是前两个背景不可避免的后果，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道德上全面、彻底地暴露了旧体制内在的深刻的弊病。这个弊病使得一亿人直接受害，整个民族都接受了痛苦的教育。而且这个教育不是短期的，为期十年。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是几代人的教育，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育。

在这样三个历史背景下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实现现代化，要圆强国梦，资本主义回头路是没法走的，苏式社会主义老路是走不下去的。只有一条，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当小平同志起来振臂

一呼，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时，党心、民心大振，党心、民心热烈拥护。这就是我们这场经济改革的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历史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最根本的是五条：

1. 一个崇尚理想、遵守纪律又富有牺牲精神的人民

人民是一切事业的基础，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这是肺腑之言，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和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理想，这在全世界是鲜见的，也往往是某些西方人士难以理解的。因此，中国人民为理想献身，顾大局，识大体，遵守纪律，同心协力，在必要时只要政府讲明白总是十分自觉地充满着牺牲精神。正是这些品德和精神帮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2. 一个成熟的领导改革的核心力量

领导中国这场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有五千多万党员，其中包容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特别是经过大半个世纪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挫折的磨炼，最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总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民主革命时她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就是铁证。同时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包括她犯严重错误及其纠正，都证明了这个党是不谋一己之私利，而是真心实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因此取得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信赖。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起了杰出的作用，他成为这场伟大改革的总设计师。

3. 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一败一伤结束，开辟了一个多极化世界的新纪元。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虽然世界并不太平，但是毕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世界大战，世界上也再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直接干预和阻止中国人民实现自己一个多世纪的强国梦。这就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国际和平环境。

国内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人心思定，党心思定，也是近一百多年来所难得的社情民意。

4. 一个爱国的海外华人社会

中国有 5000 万华侨或华裔分布在全世界。邓小平曾说过，这是中国一大国情，一大优势。他们最能体会祖国的盛衰与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和命运休戚相关，在近代中国备受内忧外患的历史中，形成了炽热的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所以，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他们感到欢欣鼓舞，用各种形式，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给予祖国以有力的支持。

5. 一个较强的物质基础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历尽各种挫折，毕竟建立起一个较强的社会物质基础。特别是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科学技术能力（包括人才）。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可以称道的。即使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是经济改革的主要命题和难点，但是它对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有这些都对社会主义改

革和现代化建设起了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作用。

有利条件是一个客观存在，如何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些有利条件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困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五大基本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小农经济传统。小农经济从体制到观念，基础广泛，传统深厚。不仅广大农村保留着传统小生产方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我们的许多企业是“大而全”，“小而全”，单位所有制，政府的绝对权威，平均主义分配，以及“农业集体化”等等，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小生产的传统烙印。缺乏现代化专业分工生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协作。就是在今天，当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的时候，我们都能找出来，小生产传统是如何影响着很多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譬如说，每年上千亿地印钞票却还要“打白条”，高储蓄、高通货膨胀和高速度发展并存，从一般的经济学来说都是不能理喻的事情，但是在中国都是实实在在的现象。

第二个改革的困难就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群体。如果说计划经济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那么它一天也不会存在，早就被推翻了。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至今仍然成为改革的巨大的阻力，就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有些人得到了既得利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计划经济。

有四个方面的社会群体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第一是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是直接执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官员。我不是说这些人在个人品质上有什么问题，而是由于处在那个地位，直接间接地或多或少地从计划经济中取得了利益。第三就是吃“大锅饭”的职工。我们的企业、

单位里面差不多有 1/3 的人是多余的。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是都是相对无能的人。他们享受的是传统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分配的好处。所以他们始终留恋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一旦要改革到市场经济的时候，他们就不能适应竞争和真正的“按劳分配”。因此，他们就开始抱怨，就成为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基础。第四，就是享受“一平二调”利益的经济落后地区。中国是个大国，发展不平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达地区把自己的利润都上交给中央，中央再“一平二调”给这些落后地区。这些落后地区就成为“一平二调”的既得利益者。从以上分析可见，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拥护者即社会基础是相当强大的。

第三个困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模式和经验。许多东西必须要在实践中探索。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在这个方面我们碰到了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互相背离的，是不能结合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碰到了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它根本不可能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我们必须打破这两种教条，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勇于探索、创新。创新是很艰难的，曲折和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国际环境严峻，我们又失误不起，这是一个基本的困难。

第四，困难，我们中国的国情是：底子薄，人口多，发展不平衡。这个不是体制改革的直接困难，它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困难。但它也是我们中国改革运行的基本的环

境，对我们顺利改革有很大的制约。

第五个困难，我们的经济改革是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强大的实力和竞争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改革开放，要吸收外国资金技术，要参与国际竞争，这就无疑地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处于一个困难的地位。加上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干扰就破坏了改革的国际环境。虽然它本身也不是体制改革的直接困难，但是对我们改革的进程也有很大的制约。

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五个基本困难。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可能找到和理解中国改革的正确道路。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有四条：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之初首先进行真理标准的全民大讨论，重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接受实践的检验。大胆地试，大胆闯。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作为最后检验，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国力增强都是可以采纳的，都是属于我们改革之列。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凡是一切有利于今日中国现代化的东西，我们都认为它是属于或有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第二，我们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与此同时相应地推进着政治、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力求协调前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农业改革先行，“民以食为天”，这就创造了一个社会稳定的大前提，而且中国巨大的农村市场的崛起也强劲地推动了整个经济发展。

第三，我们的改革是一种渐进的改革，减少了阻力。同

时每前进一步都使人民受益，增加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凝聚力。

第四，基本经验是干部实现了“四化”。我们第一代干部是当年“扛过枪、渡过江的”，打下江山的老干部。他们对于创建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一般来说，他们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知识是不够的。在十几年的改革中，小平同志提出来要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整个干部队伍可以说是全部更新了。目前我们处以上的干部，县团级以上的干部都是大学、大专学历，许多是硕士、博士，还有留学回来的。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这场改革的成功。

我们的改革也有几条基本的教训。

第一个基本教训，我们的改革理论准备不足。中国改革可以说是仓促上马的，对于现代化的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都研究不够，知之不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例如我们花了十几年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进进退退，以及反复的理论争论，才在1992年党的14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确定这个改革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许多改革走了弯路。

具体地说，譬如我们实行了权力下放的改革，把中央的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得我们许多地方有更大的活力来展开竞争。但是计划经济的本质没有改变。也就是由中央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地方的计划经济。因此一方面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增大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诸侯经济”、各自为政的现象，破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权力下放始终没有有效地下放到企业身

上。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从中央的计划经济转到了地方的计划经济之中，至今仍然缺乏活力。

再如我们曾经作了一个“利改税”的改革。“利改税”的改革方向是很正确的。本来应该接下去就是政企分开，让企业能够独立自主地在市场上展开公平竞争，可是没有实现，接着走上了承包制。承包制也确实使我们的企业增加了一些活力。但是，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承包制是计划经济加上了一个小生产的自主。因为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在于计划的指标，譬如说，本来企业的计划指标是一亿，现在是由企业承包一亿，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一个是下达的，一个是承包的。那个指标还是一样的。因此，赞成计划经济的官员很乐意接受承包制。另外一个方面，企业为什么也愿意接受承包制呢？因为企业在完成了国家的承包指标以后可以有一些小生产者自主。但是承包制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从此国有企业内没有了国家利益的代表。本来厂长是代表国家来管理企业，一下子厂长变成了企业代表，向国家去讨价还价。以国家的技术设备展开了短期行为经营，拼设备，不重视产品创新、技术改造，有钱大吃大喝，亏损找政府，甚至以权谋私，使国有资产流失。应该说，“利改税”后承包这条路子走了弯路。

再如“拨改贷”。当初企业是政府无偿拨款投资，改成了银行贷款。这个方向也是正确的。接下去就应该是让企业独立自主，自我发展，自负盈亏。但是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下，这样一个拨款改成贷款以后，仍按原规定，利税全部上交。企业为了技术改造去贷款，却没有能力去还这个贷款。因为贷款所带来的效益利润又全部上交给国家了，企业当然就永远无法还清这个贷款。结果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技术